

# 红旗

HONGQI

13



一九六一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一年第十三期 ★

## 目 录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刘少奇 (1)

社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4)

###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范若愚 (19)

谈胸中有“数”.....闻仲润 夏金 (25)

认识规律，运用规律.....卢之超 (30)

稻田水旱轮栽和“以田养田”.....丁颖 (37)

肯尼迪的二三事.....黄钢 (45)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

刘 少 奇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英勇斗争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人民曾经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的、前仆后继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是，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直到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国人民才找到解放自己的最好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运用这个武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出了正确的斗争目标、方针和方法。从此，中国人民的节节胜利就成为不可抵抗的了。

在四十年中间，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一起，做了许多事情。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中国进行人民民主革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本身的软弱性，不可能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达到胜利。这个革命的领导责任，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有许多人，在很长时期内，企图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制度，但是，最后都破产了。在中国要建立的共和国，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党团结了全国人民，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一共用了二十八年的时间，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件事，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这件事情，已經做了十二年，現在正在繼續做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轉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质上是无产階級专政。十二年来，我們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現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很长的時間。为了實現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則需要經歷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但是，誰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經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来了，中国已經不再是停滞不前的国家，而是正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的国家了。

在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民主革命得到了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設得到了第一步的胜利，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多次預言，中国革命和亚洲各国革命，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发生深远的影响。这个預言，开始成为现实。毫无疑义，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全世界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因此，它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和爱好和平人民的欢迎，也受到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仇視。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过去和現在都恶毒地詛咒我們，将来还要繼續詛咒我們，这是必然的，不足为奇。但是，这对我們絲毫也不会有所損害。

四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偉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忠貞不渝的。它对于国内国外的敌人是不屈不撓的。它已經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并且将要领导中国人民繼續取得更大的胜利。

当我們回顾四十年历史的时候，我們对于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而牺牲的光荣的先烈們，表示崇高的敬意。他們之中，許多是共產黨員，許多是劳动人民，許多是党外人士。他們在斗争中，流尽了自己的鮮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們是永垂不朽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結合的历史。毛澤东同志說：“我国的革命和建設的胜利，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們党的一貫的思想原則。”

在我們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站在我們最前头的，最善于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就是我們党的領袖毛澤东同志。

毛澤东同志面临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的情况，正确地提出了和解决了一系列的理論和策略的問題，使中国革命能够繞过一个一个的暗礁，夺取一个一个的陣地。

毛澤东同志，从对中国社会階級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规划。他指出，中国革命必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人民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他們是很强大的。但是，中国人民中蘊藏的革命力量則是更强大的。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絕大多数。中国工人階級同广大的农民建立了强固的工农联盟，并且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結了各民族、各革命階层的人民群众，就能够战胜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澤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統一战綫和党的建設等問題，这些都是我国民主革命中最根本的問題。

在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八年的长时期中，絕大部分時間，我們党的領導是正确的。但是，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右倾和“左”倾的錯誤。其中，以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錯誤，和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四年以王明同志为首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錯誤，最为严重。这些錯誤，都違反了毛澤东同志所提出的正



确主張，使党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到損失。我們党在斗争中所积累的許多正面和反面的經驗，教育了全党，提高了同志們的觉悟。党在毛澤东同志领导下，克服了右傾和“左”傾的錯誤。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會議，确立了毛澤东同志在全党的領導。从此以后，我們的革命事业就順利得多了。

一九四二年在我們党内开始的整風运动，經過三年多的時間，使全党干部得到一次最深刻的教育，更多地学会了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党的总路綫和各项具体政策，真正为全党絕大多数干部所理解。联系群众、調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風，成为全党統一的作風。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全党在毛澤东思想旗帜下，达到了空前一致的团結。这样，就保证了我們党能够正确地領導全国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結束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偉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使人民民主革命迅速地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当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发表了《論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論文。这篇論文，說明了自从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以后，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篇論文，总結了我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經驗。同时，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轉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們又在全国的新解放区内进行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同时还进行了鎮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的偉大斗争，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进一步地扫清了道路。

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制訂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指导下，可以說，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較迅速，比較順利。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們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工农联盟的理論和农业合作化的理論，总結了我国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經驗，并且按照解放后的我国具体条件，依靠貧农和下中农，巩固地团結其他中农，通过各



种过渡形式，使我国农业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运用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的思想，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思想，总结了我在革命根据地中关于工商业政策的经验，并且按照解放后的我国具体条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相结合的政策，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实现这种改造。

在执行上述这些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中央及时地克服了某些右的和“左”的偏向。同时，在运动中不断地总结经验，规定了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所必要的一整套具体政策。于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在农业还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五亿多农民就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由此而促进了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一九五七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后我们应该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指示，严格划清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根本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线，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去继续解决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两类不同的矛盾。除开对于敌人应该采取专政的方法以外，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应该坚决执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吸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在我们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的



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条总路线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可能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实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使我国能够比较迅速地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为先进的国家。

我国现在还处在经济落后的地位。帝国主义还在欺负我们。我国人民迫切要求摆脱落后的地位。毫无疑问，我们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符合我国全体人民的愿望的。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从一九五八年<sup>①</sup>以来，我国实现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同时，在我国农村中，出现了由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的人民公社。这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成为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三面红旗。

在大跃进的三年中，工业方面，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建立了相当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使基本工业的生产设备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农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为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文化教育事业，在这三年来，也有很大的发展。

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建设各个战线上，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民群众在大跃进运动中，发挥了创造新生活、新历史的伟大力量。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

我们的总路线，是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备起来的，为实现总路线所必要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具体办法，也是要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备起来的。在三年大跃进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具体办法都有了发展。同时，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再加上连续两年的大灾荒，就造成了一些暂时





的困难。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经济和文化都落后的大国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件新的事业，不遇到困难，不发生缺点，是不可想像的。历史经验证明，任何困难和缺点，不仅不能吓倒我们，相反地，我们总是在发扬成绩、克服各种困难和缺点的过程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正确的。我们完全相信，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党全民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克服暂时困难，继续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四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都是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一切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斗争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是经过各种考验的，因而是最巩固的团结。

我们的一切成就，应该归功于全国各族的人民群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各个战线上正在进行英勇斗争和辛勤劳动的工人、农民、工程技术人员、教员、教授、科学家、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卫生工作者和其他劳动人民表示敬意！我们向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爱国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海外侨胞们表示敬意！我们向保卫祖国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表示敬意！我们向在各个斗争岗位上勤恳工作的全体干部和党员表示敬意！

工人阶级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领导力量。我国工人将继续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先锋作用。工人阶级要继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更好地担负起领导阶级的责任，在实际行动中表现自己是最能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阶级。

工农联盟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基础。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只有充分调动五亿多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全面地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前提。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根本方针。工业



和其他有關部門都必須全力支援農業，尽可能地多生產農業生產資料，保證農業發展的需要。各級黨委和各級人民政府，都必須認真、徹底、全部地執行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的政策和辦法，健全和鞏固以生產大隊所有制為基礎的人民公社，發揮人民公社制度對於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優越性。

知識分子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國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地擴大了，他們在思想的自我改造中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各個戰線上，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我們要繼續擴大知識分子的隊伍，繼續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我國社會主義的科學文化事業更加繁榮起來。

我國人民的大團結，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包括兩個聯盟，一個是工人階級同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的聯盟，另一個是勞動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勞動人民的聯盟。我們應該繼續執行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在經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在政治、思想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中也有了新的進步。應該幫助他們，繼續進行根本改造，使他們成為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中國共產黨是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雖然我們有一千多萬黨員，但是在全國人口中仍然只占極少數。在我們的各個國家機關和各項社會事業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黨外的人員來作。如果我們不善于依靠人民群眾，不善于同黨外的人員合作，那就無法把工作做好。”

為着把全國人民大團結的工作做好，為着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好，我們全體黨員必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健全黨的組織，加強黨的團結。

我們黨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



后入党的，百分之七十是一九五三年以后入党的，这是党的新的血液，但是他们缺少经验，许多人还没有受到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解放以前入党的党员，经历过流血的革命斗争，现在是我们党的骨干，他们对于革命是熟悉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经验不多的。因而，不论新党员，或者老党员，都有一项严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同志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在全党展开一个新的学习运动，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学习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全党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以便多快好省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全体党员干部，都应该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学习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所阐明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学习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于大量的新党员，还必须给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全党干部都应该通过这个学习运动，自觉地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发扬我们党的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这就是必须像毛泽东同志一贯所说的那样，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的环境作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从客观的实际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要使中国革命得到胜利，就一定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说：“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从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因为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有正确的阶级势力的估量，才能产生出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为了这个，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这种作风，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并不是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作风的，更不是一开始就具



有这种作风的。在我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中，我们党内产生的脱离实际的右倾错误或者“左”倾错误，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忽视对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以为凭主观想像、凭一时的感想、或者仅仅摘引某些书本上的个别语句就能指导中国革命。大家知道，这些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遭受各种挫折。我们的同志必须记住这种教训，在工作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防止和克服各种主观主义的作风。

我们党是善于学习的。对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经验的，经过在实践中努力学习，我们认识和掌握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力戒自满。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地告诉我们戒骄戒躁。他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他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我们知道，满足于—知半解，自以为懂得很多而懒于学习，就是对人民革命事业缺少责任心的表现。这种错误态度是我们坚决反对的。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学会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我们的党，不只是同中国人民共命运、同呼吸，而且从来认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全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部分，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部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一贯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紧紧地同全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

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各国进步势力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中国人民也用自己的努力和斗争，来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进步的、正义的事业。这种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国际主义的团结，对于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兄弟党，向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向斗争中的各国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方针是：发展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項原則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我国所实行的对外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它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事业。我国已经同四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遍布全世界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的、文化的、友好的联系。我国建设的成就，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赞扬。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美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孤立我国的阴谋，已经被粉碎了。

坚决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至今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在我国附近的许多地方继续保持着军事基地，配备着庞大的军事力量，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严重地威胁东方和世界和平。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正义完全在我们这边，全世界人民同情和支持我们。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战争威胁，是一定要失败的。我国人民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的目的，是一定要实现的。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帝国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矛盾愈益深刻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帝国主义统治的地区已经大大缩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堤防，不断地遭到人民革命洪流的冲击。帝国主义各国之间，首先是美国同英、法之间，争吵和倾轧正在加剧。帝国主义的处境很不妙，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美帝国主义尽做坏事，充分表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它的所作所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至今顽固地坚持扩军备战政策，到处侵犯别国的



主权，并且积极扶植西德和日本軍国主义，在西方和东方正在形成两个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在亚洲的老挝和南越，在非洲的刚果，在拉丁美洲的古巴，都出现了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战争势力，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險，仍然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美国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两手”政策，一面狡猾地使用“和平”手段，一面加紧推行战争政策。斗争中的各国人民懂得，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具有危险性。但是，不论美帝国主义玩弄什么手段，都不能阻止世界人民的觉悟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决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願，把已经解放的人民的手足重新捆绑起来。他们任意横行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显。社会主义、民族解放、民主和世界和平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

莫斯科会议声明說：“这几年的主要总结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它的国际影响的急剧增长；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迅速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阶级搏斗日益加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更加衰落和腐朽。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的这种伟大团结，是全世界人民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建设事业，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苏联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成功，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作了不懈的努力。它们所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世界范围内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普遍裁军、停止核试验和締结对德和约等和平倡议，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广泛支持。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日益深入和广泛地开展着反对帝国主义及



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在亚洲，老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和侵略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日本人民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追随它的日本反动派，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斗争。在非洲，一系列国家获得了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屈地坚持着民族解放斗争；刚果、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人民，正在继续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者而斗争。在拉丁美洲，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正在发展着，古巴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雇佣军以后，继续胜利地巩固和发展着自己的革命事业。

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加入了反对垄断资本压迫、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维护民主权利的斗争行列。

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是全世界人民最迫切的要求。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已经成为当代最强大、最广泛的群众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全世界人民日益团结，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力量为核心、包括民族解放力量、民主力量和和平力量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只要全世界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新胜利。

国际经验和中国经验，都在不断地证明着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人民的力量，是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伟大的力量。归根到底，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在有了正确领导的、团结一致的人民力量的面前，任何困难都一定会被克服，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 社論



## 发揚党的优良傳統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光荣的伟大的四十年。在这四十年当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并且卓有成效地进行了規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設工作。

中国民主革命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进行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資产階級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极端野蛮的反动統治，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中国資产階級政党虽然曾經领导过中国的民主革命，但是它們沒有也不可能提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后，中国革命出現了一个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克服了右傾和“左”傾机会主义的錯誤，正确地規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綱領、政策和策略，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我們党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同一切民主力量建立了广泛的統一战綫，經過长期地领导农民进行武裝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圍城市，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在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继偉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国际上出現的重大事件。

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我們党又领导中国人民不停頓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階級专政。我們沒收了官僚資本为国家所有，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經濟。我們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上，紧跟着土地改革以后，迅速地、逐步地經過互助組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使农民的个体經濟轉变成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經濟。我們又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使民族資产階級的工商业轉变成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就在我国消灭了資本主义制度及其产生的根





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又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一九五七年我们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贯彻执行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并且在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三年中，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工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大大加强。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在农业方面，三年来人民公社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农田水利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在广泛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所有这些，不仅减轻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连续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农业的增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同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特别是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分不开的。中国人民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促进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成熟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培养和发展了自己的优良作风，在一切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执行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虚心向群众学习。过去，我们坚持和发扬了这样的作风，保证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当前，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党党员和干部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的作风，来为实现这个艰巨的任务而奋斗。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根本作风。毛泽东同志指出：“‘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党从来认为，必须用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研究中国的实际問題，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我們党在各个时期所执行的正确的路綫、政策和方法，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产物。

在民主革命的二十八年中，我們党从沒有經驗变为有了一些經驗，以至有了丰富的經驗，这个过程也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結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的錯誤，有的同志犯了經驗主义的錯誤。教条主义者和經驗主义者从两个不同方面違反了理論和实践相結合的原則，違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則。他們的思想和工作都不是从客观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願望和主观想像出发，所以他們必然在工作中碰壁。毛澤东同志說：“这种反科学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純的一种表现。”通过反对右傾錯誤和“左”傾錯誤的斗争，特别是經過了一九四二年的整風运动以后，全党多数干部深切地懂得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懂得了必須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我們的行动才能有正确的向导。这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的問題，就在全党範圍內得到了解决。

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結合起来，認識和掌握各方面工作中的客观規律，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快要开始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就說，許多我們所不熟悉的事情正在強迫我們去做，許多我們所不懂得的东西正在要求我們去学会。十二年来，我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風，运用理論和实践相結合的方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已經学到了很多東西，取得了許多經驗，因而制定出符合于实际需要的路綫和政策，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績。在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建設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的事业，它包括各方面的复杂工作，我們的經驗还不足。要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实践完滿地結合起来，从而更完全地、更深刻地認識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中的客观規律，仍然是摆在我們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这就要求我們必須繼續发揚实事求是的作風，虛心地、認真地了解客观情况，不断地研究和总结工作經驗。我們党的正确的路綫和政策都是严格地依据事物的客观規律而制定的。我們必須从实际出发，研究不同地区、



不同时间、不同条件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执行党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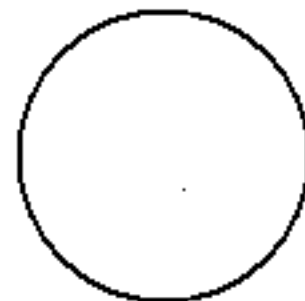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们必须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认真地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对于每一个重大事情，都要深入群众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只有经常地进行这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才会有一切工作的胜利。

坚持实事求是，进行调查研究，离不开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在任何时期都是党的一条根本路线。我们在革命中的一切胜利，没有群众路线是不可能取得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需要坚持执行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在过去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大跃进的三年中，都显著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我们党员和干部越是认真地为群众谋福利，群众就越能深刻地认识到党和国家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干部，不论有过多大功劳，不论担任什么工作职务，都必须以平等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和群众同甘共苦，密切关心群众的利益，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要关心群众的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必须重视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当前利益。我们党员和干部必须时时刻刻了解群众的要求是什么，群众心里想的是什么，使我们的一切工作符合于群众的要求，符合于群众的觉悟水平。

人民群众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人民群众的事情一定要由人民群众自己作主，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恩赐观点是根本对立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出发，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依靠群众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收到好的效果。领导者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意见，有事同群众商量，这样就能正确地指导群众运动。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自己下决心，出主意，干部不应当包办代替，不应当采取恩赐观点。领导者应当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并且帮助群众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经验而获得正确的认识，正确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都要求我们具有谦虚谨慎的态度，努力学习，反对骄傲



自滿，自以为是。毛澤东同志說：“必須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东同志还經常告訴我們，自己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就要虛心学习，就要向群众請教，切不可強不知以为知。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繼續做学生，才能繼續做先生。我們黨員和干部，愈是謙虛謹慎，同群众的联系就愈加密切，学到的东西就愈多，进步就愈快，工作上的成績就愈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地位，我們的各項事业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我們的成績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我們永远不能滿足于已經取得的成績，否則就不能繼續前进。群众对党是衷心拥护和热爱的，这首先是由于我們党能够很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是由于我們黨員和干部甘心做人民群众的勤务員，而且能够恭恭敬敬地做群众的小学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新的为我们所不熟悉的事情会不断地提到日程上来。我們一定要繼續保持和发揚謙虛謹慎的态度，戒驕戒躁，虛心向群众学习，經常进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接受群众的監督，把工作做得更好。

四十年来，我們取得的胜利是偉大的。当前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是很好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和各項方針、政策在實踐中証明是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設的积极性是高漲的，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是團結一致的，全党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實踐中积累了許多經驗，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民主的力量，和平的力量，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东風压倒了西風。回顧过去，成績輝煌，使我們兴奋鼓舞；展望未来，前途无限光明，使我們信心百倍。我們全体黨員和干部應該更好地发揚党的优良傳統作風，更好地貫徹执行党的路綫和政策，更好地联系群众，組織群众，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各級党組織，应当把教育和提高干部作为当前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务。在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下，广大干部經過刻苦努力，虛心学习，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

讓我們全党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團結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满怀信心地繼續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加偉大的胜利。



# 理論和实践相結合

## 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

范若愚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学习》的著名报告中，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問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是共产党人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問題。

毛澤东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結合的历史；同时指出党内在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不注重研究中国现状、不注重研究中国历史、不注重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应用等等极坏的作风。必須克服这些极坏的作风，把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加以改造，才能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地結合起来。

早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中，毛澤东同志就一再強調，馬克思列宁主义必須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結合。他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說来，就是要学会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sup>①</sup>在《改造我們的学习》

一文中，毛澤东同志又着重地提出了这个問題。在毛澤东同志的号召下，經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党内整風运动以后，全党深刻地認識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危害性，进一步采用理論联系实际的方法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注重了調查研究工作，注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历史已經证明，全党干部坚持了毛澤东同志提倡的这种好的作风，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偉大胜利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經驗的概括。只有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才能找到彻底摆脱奴役的出路。人們从一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不論在經濟先进的国家，还是在經濟落后的国家，不論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是不可能取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頁。



得胜利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取得的。毛澤东同志說：“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則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①

在毛澤东同志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努力的就是，使自己能够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善于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則，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各种問題。

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則，乃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根本要求。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始人三番五次地指出，他們的学說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們要求各国共产党人要善于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具体地、創造性地运用他們的理論原則。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必須通过一定民族的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偉大的作用。

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历史傳統和風俗习惯等方面都不相同，无产阶级在各个国家的具体任务，以及实现这

些任务的方法，也就不能不有很大的差别。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进行直接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却首先要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还有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则要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如此等等。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环境、斗争任务和斗争形式的区别，决定了他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中，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列宁說得很对：“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②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正是要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地对各国的具体特点做出具体分析。共产党人如果离开一定国家的特点来談馬克思列宁主义，这只能把馬克思主义变为抽象的、空洞的教条。离开一定国家的特点来生硬地套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絕不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真理是具体的，只有善于具体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問題

①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5頁。

② 《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濟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65頁。



时，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談到某一国家（例如，談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綱領），那就要估計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sup>①</sup>

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死板的公式，它給无产阶级提供了进行革命斗争的一般指导原理，提供了能够科学地認識客观现实的立場、观点和方法。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但要善于运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要善于运用他們观察問題和解决問題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机械地抄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結論，这是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不取的。这样作不但会損害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而且会破坏生气勃勃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本身。列宁指出，馬克思主义者應該从馬克思的理論中，利用已經創造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来具体研究和把握本国的社会关系及其演进情形。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不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运用这种立場、观点和方法独立地分析本国的具体实际，从中引出固有的客观規律性，指导自己的活动，这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列宁曾經对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說过：“我們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來說，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說，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

国。”<sup>②</sup> 列宁还对东方的共产主义者說过：“你們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沒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須根据欧洲各国所沒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須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資本而是中世紀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別崇高的任务”<sup>③</sup>。

各国无产阶级的最終目的、最高綱領、策略原則是相同的，但是，这种統一性并不否定各国共产党在制定具体斗争策略时的多样性。列宁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之間、各个国家之間的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苏維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时，在細节上把这些原則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适用于这种情况。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徑来解决統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傾教条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

① 《論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1頁。

② 《我們的綱領》。《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188頁。

③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頁。



維埃共和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时候，都必須考察、研究、探索、揣測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sup>①</sup>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各国共产党組織群众进行斗争的武器。馬克思主义者應該努力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定国家具体化，應該按照民族特点去应用它。馬克思主义者愈是善于这样做，就愈能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地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就愈能發揮它的教育、組織和改造的作用。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则，是同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对立的。对于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都作了正确的說明。修正主义者借口民族特点，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閹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否认实行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必要性，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则。这是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我們必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者只知道背誦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的若干詞句，机械地搬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个别原理和現成結論，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生动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板的公式。我們也必須坚决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

理是无产階級斗争經驗的科学总结，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的一般規律。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就能够从总的方面判明无产階級斗争的局势，了解周圍事变的內在联系，預察事变的进程。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結合起来，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本国革命的具体問題，是最好地在本国实现馬克思列宁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不同的国家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来解决本国革命的具体問題，就会經過自己的革命实践总结出自己的新經驗。这样做就能够保证統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在不同的国家里以不完全相同的形式实现。这样做不仅不会損害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可以用自己国家的經驗来丰富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是一个逐步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認識本国具体特点的过程，也是一个反对右傾机会主义或者“左”傾机会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或者經驗主义的斗争过程。在我們党的历史上，正如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在党的幼年时期，革命虽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由于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也发生了錯誤，在革命历史的紧要关

<sup>①</sup>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3—74頁。





头党内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他们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完全没有警惕，因而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到了革命的第二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领导群众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然而，这时也有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特别是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最为严重。犯这些错误的同志不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不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不根据这些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曾经又一次地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教育了全党，教育了干部，使全党干部认识了毛泽东同志从第一次大革命以来所主张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使全党干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获得了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了解。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

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只要我们继续努力，进一步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够继续取得新的胜利。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本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具体地研究本国的现状和本国的历史，从中求出本国革命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导师们在运用自己的理论分析一定国家的一定问题的时候，总是要大量占有关于这个国家的这一问题的现状的、历史的材料。恩格斯在评价《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一书的时候说过，“马克思把图画描绘得如此巧妙，使得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一些新的证据来证明这幅图画曾是把现实反映的极为真确的。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了解的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的如此明白，这真是无可伦比的。”<sup>①</sup>马克思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恩格斯接着指出，这就是因为马克思平日“不只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详细考察了法国当时的历史，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所以，事变是从来也没有使他张皇失措的。”<sup>②</sup>《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是经过对于法国的历史、现状进行了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4年版，第22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22页。



调查研究写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导师们论述其他问题的著作，也都是经过调查研究写出来的。如果他们还没有对某一国家的某一问题进行过调查研究，他们宁可暂时不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恩格斯在《给豪威克的信》中说：“至于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农民对革命运动可能有什么贡献等等，在我还没有把整个问题事先再加以研究，还没有用最新的材料来充实我对事实真相的极不完备的了解以前，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对这些问题提出可以公开发表的意见。”①在《给阿塔贝库茨的信》中又说过：“不管我怎样感谢你向我有趣地描述了阿尔明尼亚的状况，但是要对那些不是由于亲自调查研究而知道的事情作出判断，我仍然不能认为这是

正确的和公正的。”②列宁在批评考茨基的时候说过：“让卡·考茨基那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我党的分裂单听一面之词就用痛切的言词去搪塞吧。他们不了解真相还是情有可原的，——虽然，硬要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妄加议论当然是不可原谅的。”③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运用自己的理论解决一定国家的某一实际问题的这种严格科学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5—3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俄文第1版，第341页。

③ 《色房内菲》。《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5页。



延安枣园——毛主席故居（木刻）

修 军



# 談胸中有“数”

聞 師 潤 夏 金

运用数量和质量統一的規律，来研究事物及其变化，是毛澤东同志领导我国革命斗争的一种工作方法。关于这种工作方法，毛澤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作了概括，并用我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个成語来表述，叫它做“胸中有‘数’”。他說：“胸中有‘数’。这是說，对情况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沒有数量也就沒有质量。”<sup>①</sup>

为什么必須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作基本的数量分析？这是因为，要做好任何一件工作，都需要系統地深刻地掌握和研究事物的全部情况；而从数量上把握事物及其变化，是深入地具体地認識和掌握情况所必需的。

按照客观事物自己的特点，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它的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并且二者之間表现为一种辯证的关系。沒有一定的质量的数量是不存在的，同样，沒有一定数量的质量也是不存在的。要真正認識一个事物，必須从质与量的統一上来把握，忽略质量方面，固然不可以，不注意数量方面，也不能对事物有完整的認識。事物的数量方面，如位置、大小、多少、程度、运动速度等，反映着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具体状态。因此，只有对于事物的这些数量方面有一个切实的了

解，我們对于事物的認識才是詳細的而不是粗略的，是具体的而不是籠統的，是精确的而不是馬虎的。而为了在實踐中改造事物，首先便需要对事物具有精确的具体的認識。

在工作中，对于情况和問題的数量方面掌握得愈精确，提出的任务和制定的政策就愈为符合实际和愈有实现的可能性。在《毛澤东选集》第四卷中，我們看到，毛澤东同志为了具体把握敌人軍事力量的情况，在了解研究敌军质量的同时，对于数量方面的情况也給予了极大的注意。在他的指导軍事斗争的文章里，都用許多篇幅，詳細地列举了有关敌人兵力的各种統計数字。不但有对敌人正規軍的統計，也有关于地方杂牌軍的統計；不但注意总兵力的統計，也注意敌人兵力的分布；既統計一定时期敌人在第一綫和后方的兵力，又对第一綫的兵力多少用于守备和多少用于机动作了調查，以至于在一定的部署下，各地区敌人的数量和距离，由一地到另一地增援需要多少時間等等，都作了詳細而精确的調查和研究。正因为这样，所以对于敌人的軍事力量，便真正做到了了如指掌。显然，毛澤东同志在指导軍事斗争中的英明預見，以及他总是能及时地識破敌人的軍事

<sup>①</sup> 《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3頁。



阴谋，善于巧妙地制定歼敌的策略，是和他对敌人的军事力量从质量方面又从数量方面的详细把握分不开的。为了制定正确的土地改革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农村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对农村封建剥削的程度，以及各阶级和各阶层对土地改革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等等，都有一个明确的数量方面的统计和分析。在民主革命总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同志依据这些统计和分析，正确地制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方针。由此可见，要具体地认识和掌握对象，就需要在注意质量方面的同时，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注意对事物作数量的分析，而具体地认识和把握对象，是做好任何一件工作的基本条件。

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每一方面的数字对于了解这一事物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事物来说，都有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数量是基本的、带关键性的、能表现事物本质的，而其余一些数量可能只有辅助的补充的意义。要真正地把握事物，便需要从许多数字中进行分析研究，找出这种基本的数字。这就是，要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和主要的百分比。

在军事斗争中，决定每个时期、每个阶段军事形势的，是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包括地区大小、人口多少、人心向背、经济力量的强弱、武装力量的大小等等对比的情况。要争取军事斗争的胜利，必须全面地研

究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尤其要着重研究敌我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比。掌握了这个基本情况，就能更好地把握住斗争的发展，找出斗争的规律，从而解决战略和策略上一系列的问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每个阶段的军事斗争任务以及战略和策略方针，都是以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估计为依据的。毛泽东同志一贯地指出，人心向背、战争的性质，是战争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解放战争初期，他又指出，蒋介石战争的卖国的、非正义的、反人民的性质，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因此，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但是由于解放战争初期，敌军有四百三十万人，我军只有一百二十万人，我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因此，毛泽东同志又指出，要打败蒋介石，我们的作战方针必须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经过了一年作战，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敌我军事形势开始转变以后，毛泽东同志根据新的力量对比，提出了举行全国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方针。战争的第三年，由于敌军从战争初期的四百三十万人减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我军由一百二十万人增至三百余万人，转变了我军在数量上长期居于劣势的状况，而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以致陷入不能维持的境地，大群大群的人民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革命的力量迅速增长，全



国人民的团结空前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力量对比的情况，指出这是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这是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并进而提出了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作战方针。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仅紧紧掌握了敌我斗争发展的规律，而且在每个阶段，都从数量方面去研究敌我军事力量消长的情况，因而也就能够正确地指导每个阶段的军事斗争，使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在经济问题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如何把握住带有关键性的、起决定作用的基本的数量估计，正确地规定革命的任务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党的经济政策的论述，就是从对中国的经济情况的基本的数量估计出发的。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sup>①</sup>。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们党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作用，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并对它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通过集体化和机械化的道路，逐步改造农业和手工业等等一系列的任务和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反复地论证了这个基本情况，要同志们记住中国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个基

本数字，并十分强调地指出，谁要是忽视了这个基本情况，谁就要在工作中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说明了，掌握基本的数量统计，对于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制定正确的政策，是极为重要的。

从数量方面把握情况，还必须找出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毛泽东同志在从数量方面把握情况的时候，总是将各种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和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统一起来考虑的。对于情况和问题的数量方面作了统计和研究，也找出了带有关键性的基本统计、主要百分比，但是，如果不去找或找不出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那么我们对这个事物现在是处于什么具体阶段，以及由现阶段转入下一阶段，或由此事物转化为另一事物还有多大距离，还需要做多少工作等等，仍然是胸中无“数”的。这是因为，事物的数量界限是与事物的质直接联系着的。我们知道，事物的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最终必然引起整个的质变。因此，要改变一种事物的质，没有量的变化的积累，不经过许多部分的质变，是不可能的。由量变到质变，在新的质的基础上进行的不断量变和部分质变，又引起新的整个质变，如此不断地推移，事物便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由这一事物转化为另一事物，这是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一个根本规律。事物的数量界限也就是某一个事物由这一部分质变到另一部分质变的关节点，是这一事物转变为另外一个事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1页。



物的关节点。突破了这一事物发展的某一部分质变的关节点，这个事物的发展就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突破了事物发展整个质变的关节点，事物的性质就起了根本的变化，甲事物就不再是甲事物，而变为乙事物了。因此，掌握住数量界限，也就有可能把握住事物的发展过程，把握住由一事物转化为另一事物的规律，从而才有可能清醒地认识把一个事物由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阶段，还需要作多少努力。否则，我们就不能算懂得事物的性质和事物发展的过程，对形势的变化还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还不能算真正了解情况，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知道为了改变事物应该进行什么工作，应该进行多少工作。由此可见，在指导斗争、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我们在制定政策时，总是十分强调要有一个政策的界限，哪些人属于团结的范围，哪些人属于打击的范围，哪些事情应当办，哪些事情不应当办，都必须划分得一清二楚。这个政策界限往往与数量界限相联系，或者是根据某个数量界限所决定的。如果混淆了事物的数量界限，也就必然破坏了政策。土地改革中，正确划分富农和中农的界限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政策问题。但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毛泽东同志经过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一九四八年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指出：“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sup>①</sup>有

了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数量界限，就从富农和富裕中农这个分水岭上明确地划分了团结面和打击面。这就是务须团结占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口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打击不超过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左右，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当时，有的地方的同志由于没有重视百分之二十五这个数量界限，把一些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使工作遭受了损失，这正是由于他们超越了事物的数量界限，因而也就必然破坏了政策界限。

由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进攻阶段，由战争开始到根本打垮敌人的军事力量，也有它们军事上的数量界限。在一场特定的战争中，这些转变的关节点即数量界限，是由建立在一定政治、经济力量基础上的斗争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的具体情况所规定的。军事斗争的领导者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整个估计中，正确地找出和掌握住这些数量界限，就可以依据当前的情况提出适当的任务，以促进战争向新的阶段发展。如前所述，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因此，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军事力量对比变化到何种程度，我们才能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也就是说什么是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到战略进攻阶段的数量界限？经过对战争开始后七个月敌我力量消长变化情况的观察和研究，毛泽东同志指出，歼敌一百个旅左右就可使我军由防御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9页。



阶段轉入进攻阶段；在这个認識基础上，提出了在已經歼敌五十六个旅的情况下，再歼敌四十至五十个旅的任务。毛澤东同志說：“我軍如能于今后数月內，再歼共四十至五十个旅，連前共达一百个旅左右，則軍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sup>①</sup>。毛澤东同志的預見是如此准确，在經過一年的作战，歼敌九十七个旅，完全实现了毛澤东同志提出的作战任务后，我軍就結束了战略防御阶段，轉入了全国性的战略反攻阶段，使人民解放战争达到一个轉折点。接着，毛澤东同志对在变化中的敌我双方的情况以及双方兵力在数量方面变化的情况加以分析，找出了彻底打垮敌人的在軍事方面的数量界限，提出了五年左右時間歼敌五百个旅的总任务。后来，毛澤东同志根据战争进展的新情况，敌我双方力量消长变化的加速，又及时地提出完成歼敌五百个旅，根本打垮国民党反动派的軍事力量的任务，只要三年多的時間就可以了。事变的发展证明，正是在三年半的時問里，我軍完成了彻底打垮敌人，夺取全国胜利的偉大任务。

当然，事物的具体数量界限，由于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处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然界的事物是这样，社会中的事物更是这样。因此，我們在制定或执行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各种不同条件对事物的数量界限的影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注意基本的統計和主要的百分比，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句話，做到胸中有“数”，这是毛澤东同志一貫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正因为毛澤东同志在每一个革命时期、每一个革命

阶段，都能在掌握不断发展着的事物的质量的同时，又具体的把握它的数量方面的具体情况，掌握住正确反映这种具体情况的各种基本統計和主要的百分比，掌握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因而他能够始終对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把握住斗争的全局，把握住整个事变发展的具体进程，并根据每一时期的实际情况，提出斗争的任务，制定为实现这个任务所必需的各项政策，保证中国的民主革命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

毛澤东同志經常提醒全党同志們，在工作中要做到胸中有“数”。他說：“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sup>②</sup>正确反映事物情况的数的概念，不是头脑里臆想出来的，而是人們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刻苦的調查研究中，抽象出来的。要做到胸中有“数”，就需要我們进行艰苦的工作，細致耐心，不怕麻煩，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認真地进行調查工作；同时又要以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調查来的各种数字进行周密的分析，这样才能不为各种各样的数字所迷惑，从中找出确实能够表現事物本质的基本数字，找出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

毛澤东同志的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对于一切工作，都是适用的。只有对我們的工作对象做到了胸中有“数”，才能把各种革命工作放到踏实的基础上。

①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10頁。

② 《常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3頁。



# 認識規律，運用規律

——學習《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筆記

· 盧之超 ·

二十五年前，即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同志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系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總結了我們黨內兩條軍事路線的爭論。《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一開頭就指出研究和認識戰爭規律對於任何一個指導戰爭的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這部著作里，毛澤東同志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問題，都提高到規律性的認識上去解決，闡明了我黨正確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這是一部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取得勝利的偉大軍事著作，同時又是一部極其生動的、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著作。從學習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著作中，使我們了解到，不僅在指導戰爭的時候，而且在進行任何工作的時候，都必須認識和運用客觀規律，以客觀規律為自己行動的嚮導。本文僅就這方面談一些體會。

\* \* \*

科學的任務在於從實際出發，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主觀臆造的規律性。只有認識了規律，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人們的行動才能得到預期的結果。毛澤東同志說：“不論做什麼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物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

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決不可以用自己頭腦的虛構去代替客觀規律，決不可以拿自己所臆想出來的聯系去代替客觀事物中固有的真實的聯系。人們對於客觀實際的正確認識，是通過實踐來達到的。離開實踐，便不能正確地認識任何事物及其發展規律。“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sup>①</sup>對於戰爭，當然也是如此。毛澤東同志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讀書是接受前人的經驗，這是完全必要的，就是在革命戰爭的環境里，對於學習戰爭說來，也需注意這一點；但是，為了真正地領會前人的軍事理論，從中吸收真正有

\* 凡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①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6頁。





用的东西，必须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只有在战争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战争。

在十年内战中，“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又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认为只要照抄一般战争的规律，只要照抄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照抄北伐战争的经验，就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针对这种错误观点着重指出，在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上，要彻底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既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又要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他说：有一般战争的情形、性质和规律，而革命战争有它的特殊的情形、性质和规律，中国革命战争又有它的更加特殊的情形、性质和规律。“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和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因此，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机械地搬用已有的一般规律和一般结论。不仅外国资产阶级总结的一般战争的规律不能机械地搬用，就是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中北伐战争的规律，也不能机械地搬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不少的。”问题在于如何接受别人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指出这里的原理是：应该“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

西。”这就是说，学习和运用一般规律、学习和运用前人和别人的经验，也必须从当前情况出发，着眼于当前战争实际情况的研究，这样才能具体地决定，究竟吸收些什么，拒绝些什么，增加些什么。否则，就谈不到真正的学习，就会把一般规律和结论看成是脱离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不顾客观条件而机械套用，因而脱离唯物主义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以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为依据，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是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全面的、本质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说：“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有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

这些主要特点和根本规律，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上一系列的具体特点和



具体规律，例如内战的持久性和由此产生的“围剿”和反“围剿”两种战争形式、进攻和防御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反复，战略防御的重要性，基本的是运动战，游击战的特殊地位等等。机会主义者不承认、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他们拒绝了解中国的特殊情况，因而在上述一系列战略问题上都提出了和毛泽东同志相反的错误主张。这种不同主张的分歧从思想实质上说来，是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和从抽象概念出发的观点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分歧。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分析，生动地告诉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发现事物的规律性，就必须从分析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开始，从事物的发展变化的特点上去研究它。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再一次引述了列宁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主观主义者在认识客观规律的问题上恰恰是忘记了这一点，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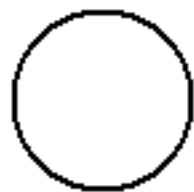
\*     \*     \*

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是认识事物的规律性的基础一环。在军事上来说，是认识战争规律性的基础一环，是正确地判断形势和正确地决定战略方针、正确地部署战役或战斗的首要前提。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

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这种调查研究进行得愈充分，认识情况就愈明，决心也就愈大，据以作出的战略、战役和战斗的计划也就愈可靠。

人们的认识在未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以前，不一定能够完全和客观情况相符合，特别在战争中，客观情况发展很快，常常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因此，毛泽东同志又强调指出下面这点：“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止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

这里所说的两个认识过程，就是说调查研究是不能间断的，是需要经常进行的。只有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摸熟自己的部队的脾气，又摸熟敌人的部队的脾气，摸熟一



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例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指导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多打胜仗。毛泽东同志批评了那些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他们不懂得任何军事计划应当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而是相反地把军事计划建立于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并且在计划一经作出之后，就不愿意重新加以检查，不愿意在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时改变已定的计划，这样的军事家是一定不免于碰壁的。

毛泽东同志在本书中用大量事实材料，用红军反“围剿”的丰富经验说明，对当时各种情况的系统的、周到的调查和侦察，对于反“围剿”的胜利有着决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本书《反攻开始问题》一节中，详细地说明了这种经验。红军在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都详细地调查和估计了各方面的情况，例如调查了“进剿”军的总人数、战略部署、指挥、分进情况；调查了分进敌军中各军的派系如何，是否蒋介石嫡系，兵力的强弱多寡如何，驻地分布情况及群众条件如何，是白区还是游击区、根据地，有无 AB 团活动，敌军战斗情绪如何，是久驻还是新到，是恐惧还是骄横，是胜军还是败军；还调查了各方面的自然条件，有无有利阵地，等等。另一方面还考虑了我军各方面的情况，例如群众条件好坏，有无有利阵地，是否经过休整，兵力集中情况，等等。在进行了这种周密调查之后，在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的情况下，才下“初战”决心，动手消灭敌人。因此，

这几次反“围剿”的“初战”都能迅速获胜，并且连战皆捷，迅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唯独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不注意对周围情况作系统的了解和分析，震惊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仓促进行“初战”，一再攻打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的城镇，屡战屡败，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证明，离开了实际调查，必然产生唯心主义的形势估量和作战指导。

毛泽东同志说：“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所谓“想一想”，就是“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就是进行科学分析的工作。人们依靠自己的头脑，对从实践和调查中得来的材料进行“联贯起来的思索”，下一番“改造制作”的功夫，用理论的形式再现客观事物的复杂过程，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既是“改造制作”，就包含有对于感性材料的扬弃，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在这里，有无正确的方法，关系很大。

例如，在如何对待进攻和防御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方面，应该看到，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另一方面，又应该看到，革命和革命战争也有防御和退却。这二者本来是相互联系着的。毛泽东同志总是在进攻中，同时指出防御和退却的作用。他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



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战略防御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我们的防御不是消极的防御，而是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与这种看法相反，“左”倾冒险主义者只是固执地坚持片面的观点，他们认为革命和革命战争只能是进攻，认为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和退却手段。而当军事上遭到失败时，他们又往往陷入军事保守主义，主张消极防御，一直发展到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为什么对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问题会得出如此相反的认识，除了重视不重视调查和掌握材料以外，还在于在思索中有没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所谓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把它形象地叫做“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个体，是发展变化的。必须采用分析的方法，从对立统一中去分析和认识它们，才能深入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应当从进攻中看到防御和退却，从防御和退却中看到进攻，在胜利中看到困难，在失败中看到胜利的前途，而不是把问题绝对化、片面化、简单化。现象和本质是有矛盾的，现象的认识往往只是反映了矛盾着的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才反映矛盾的总体。因此，对复杂的事物不作深入的分析研究，抓住一方面的现象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规律性的认识的。辩证法坚决反对把事物的任何一个方面绝对化，把它抽象地夸大为事物的全体。辩证法认为只有

在对立的统一中去认识和把握事物，才是正确的、可以理解的和合乎实际的。例如进攻，本来是革命和革命战争所需要的，但如果把它绝对化，以至否认进攻的条件，否认必要的防御和退却，就变成荒谬的、脱离实际的了。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一种全面的、深入事物本质的分析，贯穿了全书。毛泽东同志在战争问题上批判了“左”的和右的两种片面性和绝对化的观点，总结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概括地指出：“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权威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思想方法上处处是在要求认识上的全面性，反对认识上的片面性，从而解决了这些问题。



认识规律是为了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使用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在战争中，就是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实际存在的客观规律在一经认识之后，就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导方法，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更好地改造世界。

客观物质条件、客观形势是我们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人们开展主观活动的舞台。“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没有一定的客观形势，没有一定的条件，人们就不能实现某种任务，甚至不能提出某种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会抱定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因为我们仔细去看时总可以看出，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sup>①</sup>因此，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在战争中，“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始终注意分析为提出和完成各种任务所必需的条件，并努力为完成各种任务准备条件。以战略退却阶段准备反攻的问题为例。毛泽东同志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指出，红军要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所造成的下列诸条件：（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二）有利作战的

阵地；（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五）使敌人疲劳沮丧；（六）使敌人发生过失。而其中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只有在退却阶段中取得这些条件中的“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如此注重客观条件的分析，如此重视客观条件的作用，正是他重视客观规律的表现。

不懂得条件的作用，不重视条件的分析，不懂得根据客观可能性创造条件，就不懂得如何运用客观规律。军事冒险主义者不顾条件，坚决反对战略退却的步骤，主张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正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在客观事实面前碰壁。

重视条件，并不等于说，要待一切客观条件都完全具备了，才能开始行动。前面说过由战略退却转为战略反攻，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因为“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主张消极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者，不懂得主观努力的重要作用，不懂得人们可以根据客观规律创造条件、改变条件，不敢在有利时机到来时及时组织进攻。他们同样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同样只能把战争引导到失败的道路。

我们所说的主观努力，或主观能动性，

<sup>①</sup> 《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序言第3页。



其一是指正确認識客观規律的能力，正确分析和估量客观条件、客观形势的能力；其二是指根据对客观規律的正确認識，自觉地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于战争指导者來說，这就是正确地决策和正确地組織、使用自己的力量。这种主观努力，在战争中，就是对于自己的軍事力量的組織、动員和使用。

客观条件是我们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但具备了条件并不等于我們的实践任务的完成。战争的勝負，不仅仅决定于各种客观物质条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澤东同志在分析了战略反攻所需的各种条件之后說：“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軍的勝負。”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即要在战争中获胜，就需要正确的方針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就是决定的了。因此，人們可以而且应该充分發揮主观能动性，努力去做那些經過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也就是說：“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质条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战争的胜利。”战争中的两軍决战阶段，主观努力是最重要、最緊張的。毛澤东同志說：在反攻决战阶段中，“無論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脫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創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給

敌人更大的損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脫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由此可見，人們依据客观規律經過自己的主观努力，不仅能够充分地利用客观条件，而且能够在客观可能的範圍內創造和改变某些条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一书，一方面充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中作战双方既存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条件，指出我們的行动必須以这些条件为依据；一方面又充分闡明了战争的主观指导上一系列正确的原則和方法，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如何創造实现胜利的可能性的諸条件，以求改变敌我形势。毛澤东同志說：“軍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許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劇来。……我們不許可任何一个紅軍指揮員变为乱撞乱碰的魯莽家；我們必須提倡每个紅軍指揮員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駕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驟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規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我們的一切規律性的結論都是从客观实际中正确地总结出来的，当它一經总结出来之后，就又轉为指导我們行动的方法。我們在一切工作中所以要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去認識和利用客观規律，就是为了在这些工作中寻找最正确、最有效的革命方法，以爭取工作的胜利。



# 稻田水旱輪栽和“以田养田”

丁 穎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粮食生产中占着重要地位。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一九五七年）为例，全国水稻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强（百分之二十一点一），而产量则将近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百分之四十六点九），这明显地表现出水稻的高产性和它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重要性。我国农民栽培水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认真地总结和研究农民群众的这些经验，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地提高水稻以及稻田旱作物的产量，对争取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胜利，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食增产指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通过水稻与旱作物輪栽，实现“以田养田”，就是农民群众栽培水稻的一项很重要的经验。这项经验，早在六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过记载。一千多年以来，我国各地农民群众根据本地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了这项经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輪栽方式，对于提高水稻和稻田旱作物的产量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根据一些地方的调查资料，试就我国南方和

北方稻区实行水稻与旱作物輪栽和“以田养田”的生产经验，以及水稻的栽培特性与水旱輪栽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以作为研究粮食增产问题的参考。

## 南方稻区水旱輪栽的经验

淮河以南的长江和珠江流域是我国水稻的主要产区，具有气温高、雨量多、作物生长季节长的特点。这些地区，除了一些不便于排水的田（如圩田、潮田、冬水田等），或土质过粘，以及劳动力特别少的地方以外，一般都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实行一年两熟或多熟的复种輪栽制度。

南方稻区，与水稻年内复种輪栽的旱作物，在秋、冬季的，一般有紫云英、黄花苜蓿、苕子、肥田萝卜等绿肥作物，蚕豆、豌豆、冬大豆（在华南）等豆类作物，油菜、萝卜子等油料作物，甘薯、马铃薯等薯类作物和小麦、大麦等麦类作物。在春、夏季的，一般有田菁、绿豆等绿肥作物，大豆、花生等豆类作物和甘薯、马铃薯、芋头等薯类作物。水稻与旱作物分年輪栽的，一般有稻、棉輪栽，稻、蔗輪栽，稻、麻（黄麻）輪栽等。所有这些輪栽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利



用了水稻与旱作物在輪栽中相輔相成的关系，达到了增产的目的。以水稻和綠肥、豆类作物輪栽为例，这种輪栽能够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加强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增加土壤的腐殖质含量和水稳性团粒结构，改善砂土分散或粘土板結的状况，加强土壤养分的貯蓄和釋放能力，調整土壤的保水性和透水性，因而能促进作物根群发育，增加产量。这就是农民群众所說的“以田养田”。栽培綠肥和豆类作物还可以增产飼料，用来养猪或飼养其他家畜，再以猪粪和其他畜粪肥田，这就是农民群众所說的“以田养猪，以猪肥田”。种植綠肥和豆类作物，只要施用少量肥料，就能得到大量的鮮草充作肥料，这就是农民群众所說的“以小肥养大肥”。

在“以田养田”方面发挥作用最大的，是种植豆科綠肥。豆科綠肥作物可以利用与其共生的根瘤菌，吸收和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态氮素，利用其下伸的根系，吸收深层土壤中的矿质养分，以生长莖叶、繁殖种子。种植綠肥作物，只要施用少量肥料，并加以必要的管理，一般就可亩产鮮草二、三千斤，栽培得好的，亩产可达五、六千斤。一千斤紫云英鮮草的肥分含量大約是：氮四点八斤，磷酸零九斤，氧化鉀三点七斤。苜蓿、苕子、蚕豆、豌豆等鮮草的氮、磷、鉀含量比紫云英更高，肥效更大。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三年的試驗，在其他条件配合下，施用一斤紫云英的氮素，約可增产稻谷八点七斤至十一点五斤。根据湖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試驗，施

用一斤紫云英的氮素，后两季稻谷約可增产十四点二斤。从各地的情况来看，种植綠肥的多少同水稻及其他旱作物增产有密切关系。如江苏省东台县时堰人民公社莫庄大队，一九五四年实行稻、麦、棉輪栽，一九五五年改为稻、麦、棉、綠肥輪栽（綠肥占冬作物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一九五六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一，棉花总产量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点八。一般地說，在精耕細作的高产地区，綠肥所占的比重也往往較高。例如水稻产量較高的江苏省苏州专区，綠肥占冬作物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浙江省宁波专区，綠肥占冬作物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各种綠肥作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較强，可以根据气候的冷暖、干湿和田土的砂粘、酸碱等条件，选择不同的品种；可以根据前后茬作物的关系和耕作措施的不同，采用单作、間作、套作或混作的栽培方式。除了豆科綠肥作物以外，其他如肥田蘿卜等，虽然沒有固氮作用，但同豆科綠肥相似，也具有栽培容易、对土质选择不严、管理簡便、收获較早、鮮草产量多等优点。

豆类作物中，在冬季种植的有蚕豆、豌豆，在春、夏季或秋季种植的有大豆（华南有冬季大豆）、花生等。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很多农民把大豆类的泥豆、禾根豆同早稻、中稻套种或复种，增产作用也很大。关于稻、豆輪栽的增产效果，根据福建省福安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試驗，在春大豆后栽种晚稻，每亩稻谷产量为七百四十八





斤，比在早稻后种晚稻，晚稻亩产五百八十二斤，增产百分之二十八点五。湖南省实行稻、豆两熟栽培制度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一九五七年全省实行这种轮栽制度的田有一百一十万亩，分布在四十五个县。据衡南、衡山等县经验，种豆以后种早稻，比种双季晚稻以后种早稻，需肥量减少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并能获得高产。在稻田复种花生，不仅能收获油料、饲料和肥料，而且能使下茬水稻增产。广东省原潮汕县梅云农业社（丘陵地区），有一块重壤土稻田，面积一亩三分，一九五五年春分成两半，一半种花生，一半种水稻，收获以后全部种晚稻，种花生的这一半收了稻谷三百一十二斤（折合亩产四百八十斤），种水稻的这一半收了二百六十斤（折合亩产四百斤）。湖南省衡阳、邵阳等地，在秋作豆类之后，冬播肥田萝卜充作稻田绿肥，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薯类作物与水稻轮栽，由于种植薯类作物需要深耕起畦和中耕培土，可以为水稻根系发育创造深耕熟化的土壤条件。在薯茬地上种稻，稻的茎秆坚强，能够抗倒伏，提高产量。广东省原潮汕县枫溪二社，有一块犁地困难的轻粘土壤稻田，一九五六年早稻亩产三百八十斤，晚稻亩产五百六十斤。一九五六年底改种甘薯，一九五七年夏鲜薯亩产五千斤，晚稻亩产七百五十斤。另一块高产稻田有三十五亩，多年连作水稻，产量不易进一步提高，一九五五年早稻亩产四百斤，晚稻亩产五百五十斤。一九五六年改种旱作物以后，一九五七年早稻亩产五百五十斤，晚

稻亩产六百八十斤。各地生产实践证明，在丰产的薯类作物田里种植水稻，由于根群一般入土较深，发育良好，茎秆健壮，不易倒伏，穗粒充实，因而能够保证水稻的高产。此外，甘薯的蔓既是很好的饲料，又是优良的稻田有机质肥料。但是，华南地区冬季栽培甘薯，到来年四、五月间，正值薯块快速膨大增重的季节，而四月中、下旬也正是连作早稻插秧的季节，在栽培季节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些地区在五月收薯后，把薯茬田用作晚稻秧田，或种植夏季绿肥，在七月底收割绿肥后再种晚稻，这样既可提高晚稻和旱作物的产量，又可以把水稻与其他作物的收、种时间错开，便于调剂劳动力。此外，油料作物与水稻轮栽，也和薯类与水稻轮栽有相似效果。

麦类作物与水稻同属禾本科，所需肥料与水稻相似，因而在需肥上有一定的矛盾。但只要适当增施肥料，这种矛盾可以得到协调。太湖流域及云贵高原的农民，在深耕、增施肥料的麦茬田里种水稻，稻株生长健壮，稻、麦两季都获得丰收。上海市松江县城东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的晚稻高产田，云南省富民县一九六〇年亩产千斤左右的水稻田，前茬多属丰产的小麦田。值得指出的是，云南省澄江县的水旱轮栽制，第一年为水稻——蚕豆或豌豆（或油菜），第二年为水稻——苦草，第三年为水稻——小麦。在种过绿肥苦草的稻茬田里种小麦，地力较肥，可以保证小麦的生长良好；在种过小麦后的稻茬田里种豆类作物，可以促使地力的



迅速恢复，并可以在小麦收获以后，利用干燥天气，翻土晒垡二周左右，以促进土壤熟化和养分分解。这样，就使高产的小麦茬田对水稻的丰产发挥促进作用，同时把水稻、小麦、苦草、豆类换茬时间错开，便于安排劳动力。

水稻与旱作物轮栽，由于水旱栽培条件交替，使那些和水稻、旱作物伴生的病虫、杂草，失去相应的生活条件，可以减少病虫害和草害。

如上所述，南方稻区水旱轮栽的经验，是以轮栽绿肥和豆类作物来增加土壤有机质，以轮栽薯类和麦类作物来熟化土壤，并通过轮栽来合理错开茬口，调剂劳动力，减少病虫害，从而达到水稻和旱作物全面增产。但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在安排水旱轮栽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对于整个轮栽体系中的旱作物种类、面积比例、茬口安排、肥料来源、劳动力调剂和农牧业关系等，都要作出适当的规划，才能够充分发挥水旱轮栽的优越性，收到全面增产的效果。对于那些没有条件实行水旱轮栽的水稻田，则不能勉强实行轮栽。例如有些地方的圩田、潮田、冬水田以及粘土板结田等，目前多为连年种稻，一年一熟或早、晚稻连作（如在华南），这样的耕作制度，和当地的水利、土壤、肥料、劳动力等具体条件和栽培技术有着一定的关系。在这些地方，如果在排水干田后水源不能保证，耕作整地跟不上，以及作物品种的收、种季节安排不合适，勉强实行水旱轮栽，就不能得到增产效果，甚至会造成损失。至

于有些地方，有充分的水利、肥料和劳动力条件，实践证明连种水稻能够保证稳定增产时，就不必改为水旱轮栽。

### 北方稻区水旱轮栽的经验

我国北方气候干旱，水源不足，作物生长季节较短，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较大，主要是种旱作物，稻区比较分散。虽然农民很早就有在盐碱地种稻的经验，但以往水稻栽培面积很小，只是在解放以后，才得到迅速发展。在水稻生产中，农民群众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栽培方式，以改良利用盐碱洼地，不断提高粮食及其他作物的产量。

在盐碱地上栽培水稻，由于播种前灌水洗盐和稻生长期的灌溉排水作用，可以降低土壤中的盐碱成分；通过稻田淹水灌溉的作用，还可以冲淡地下水的含盐量。河北省国营柏各庄农场，在中等盐碱地种二年水稻后，在零至一百厘米深的土层内，氯的含量平均降低至万分之一点七，可以使小麦正常生长，不受毒害。但是，目前北方稻区水源不足，不能满足普遍洗盐种稻的需要。同时，多年连作稻田，如果施用有机质肥料不足，土壤就会呈现板结状态。多年种稻，容易使杂草丛生和病虫蔓延；使稻田周围旱田的地下水位不断上升，增加盐分积累。如对稻田规划不当，还会引起土壤次生盐渍化，加以种稻过程中长期淋洗，土壤中有效养分损失也多。因此，多年连作容易影响水稻产量的提高。而实行水旱轮栽，可以经济用水（例如一亩小麦生育期的用水量仅占水稻用水量的



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增加利用盐碱地种植作物的面积,调剂土壤中的养分,消灭杂草,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同时,还可以调剂劳动力和提高机具使用率,促进农业、牧业和副业综合发展。河北省国营芦台农场,一九五三年正式采用水旱轮栽制度,即在一个地段种一年至二年水稻后,换种二年至三年旱作物(小麦、大豆、玉米以及饲料、绿肥作物等)。根据该场调查,大豆茬的稻田亩产六百七十五斤,比两年都种水稻的稻田(亩产六百四十五斤),约增产百分之四,比四年都种水稻的稻田(亩产五百斤),约增产百分之三十四。小麦茬稻田亩产六百七十六斤,比相邻两年都种水稻的稻田(亩产六百三十八斤),增产百分之五点九。一九五三年以前在沒有种过水稻的盐碱地上种小麦,出苗率仅百分之四十一至六十,亩产三十八至六十九斤;一九五五年在稻茬地种小麦,出苗率达百分之九十五,八千多亩麦田平均亩产二百五十八斤。

通过水旱轮栽,种植绿肥或其他豆科作物,实现“以田养田”,在北方稻区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河北省军粮城农场的试验,种植夏季田菁,生长仅六十六日,每亩可收获鲜茎叶二千一百六十五斤,折合氮素十点六五斤,根系六百七十三点三斤,折合氮素二点三二斤,地上、地下部合计氮素十二点九七斤;种植草木樨,每亩可收获鲜茎叶一千零二十五斤,折合氮素九点六三斤,根系一千二百五十二点九斤,折合氮素五点九七斤,地上、地下部合计氮素十五点六斤。又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调查,当地农民,在种稻前一年的春、夏季旱作物(如小麦、大麦、糜子、谷子、高粱等)田中复种或套种苜蓿、草木樨等绿肥,于秋季收获旱作物后,绿肥作物仍留存田间,到来年四月返青生长,六月间水稻插秧时,取作稻田绿肥。草木樨每千斤鲜草含氮素五点六斤,每亩如产鲜草二千五百斤,即折合氮素十四斤,大约相当于硫酸铵七十斤。一般每亩田翻压下苜蓿、草木樨等绿肥二千至三千斤,可产稻谷五百至六百六十斤,这些绿肥约相当于当地常用的土粪一万五千斤至二万斤,而其成本远比土粪的成本低,肥料质量也高。除苜蓿、草木樨外,其他如蚕豆、扁豆等,也可作为夏季绿肥,供当年旱作物肥田用。又如以干旱著名的甘肃省河西走廊盐碱地的老稻区,当地农民一般都采用严格的水旱轮栽方式,以保证水旱作物的增产。轮栽年限和旱作物种类等,则主要根据田土肥瘠、反盐程度、劳动力多少等不同情况分别安排,但是一定安插有绿肥或其他豆类作物在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县和中宁县等地区,有第一年水稻,第二年小麦间播大豆或混播草木樨的二年轮栽制;有第一年水稻,第二年小麦复种糜子,第三年小麦间播大豆或混种草木樨的三年轮栽制。由于当地重视种植绿肥,水稻产量也不断提高。如中卫县在一九五二年全年播种绿肥面积不足二万亩,仅占稻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稻谷平均亩产量是四百一十五斤;到一九五九年,绿肥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稻谷平均亩产量上升到



五百六十三斤。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灌区的调查，水旱轮栽以第一年水稻，第二年小麦间种青豆，第三年小麦间种青豆并混种苜蓿的轮栽方式，收成最好。这样，水稻亩产可达五、六百斤，小麦可达五百斤左右，青豆约二百斤，平均年产量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四百斤的产量指标。由于采取三年水旱轮栽制，在水稻前作种小麦并插入青豆和苜蓿，不仅不会降低粮食产量，而且由于豆类作物在生长期間固定了大量氮素，绿肥又翻压充作稻田肥料，因而增加了土壤的肥力，节省了积肥、运肥的劳动力，又可以把原有肥料增施于旱作田。此外，绿肥在生长过程中还可以遮蔽地面，减少水分蒸发，抑制盐分上升，消除影响旱作物正常生长的一些障碍。

在滨海地区，也有实行稻田复种水旱轮栽的。据天津市一九五六年调查，南郊的二十二万五千亩稻田中，复种面积为六万三千五百五十六亩，复种作物主要是大麦、小麦、马铃薯等，后作都是水稻。根据五一农场试验，实行稻麦两熟比单一连作水稻增产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

如上所述，水旱轮栽在北方稻区起着两项重大作用：第一，可以经济用水，改良利用洼地和盐碱地，扩大稻田和旱作物的种植面积，保证增产；第二，可以稳定旱作中的绿肥和豆类作物的种植面积，有利于增产肥料、饲料，实现农牧业结合，以解决水稻增产中具有关键性的肥料问题，全面提高水稻

以及旱作物产量。根据各地的经验，增加复种面积必须考虑到劳动力和肥料等情况，统筹安排，才能够达到增产的目的。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条件（如田土肥瘠、盐分高低、作物种类、水源条件等）有所不同，水旱轮栽的方式也有多种多样。在实行水旱轮栽的时候，同样应该从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因地制宜。

### 水稻的栽培特性和水旱轮栽的关系

水稻原属沼泽植物，由其处于野生状态的祖先起，就生活在淹水土壤中，经过长期的人为选择和培育之后，形成对于淹水深浅不同的水田土壤都能适应的性能。水稻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都需要得到水的保证。它还借水来调节温度，防霜抗寒，以减少自然灾害的威胁。因而在水源有保证的条件下，产量比较稳定。这是水稻与旱作物显著不同的特性。但另一方面，水稻与旱作物也有其共同性，它也需要空气，也要求一定的“旱”的土壤条件。水稻植物体中具有通气组织，但通过这个组织经常由地上茎叶输送到根部的氧气，只能满足其所需氧气的五分之一，其余的氧气还需要通过“旱”的土壤条件来供给。如果稻田淹浸过深，或土壤排水不良，土壤中氧气供给不足，就会妨碍稻株的正常生长发育。栽培水稻所采取的技术措施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供给水稻以充足的氧气条件，有效地调节水稻需“水”与需“旱”的矛盾。



从土壤物理和土壤化学方面，都可以看出，水稻的生长发育过程是既需要“水”，也需要“旱”的。

从土壤物理方面看，一般土壤中空气的多少与水分的含量是有矛盾的。土壤空隙中充满了水，空气就被排挤出来。如果稻田长期淹水浸渍，土壤的团粒结构遭受破坏，孔隙度小，渗透性弱，排水困难，就会造成水分停滞，氧气不足，妨碍稻根正常生长。相反，排水良好的稻田或经常排水烤田的稻田，土壤的团粒结构好，孔隙度大，氧气供给充分，则水稻根群生长粗壮，伸展也较深。然而，在生产实践中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如云南省的发红田和湖南省的鸭屎泥田等，由于土壤缺乏腐殖质，冬季如果放干，土壤结构会变坏，形成板结或泥团，耕耙不易，泡水后也难以恢复原来比较膨软的性状，在这种土壤中栽培水稻，往往生长不良，形成减产，只有在常年淹水的条件下，才能保证产量稳定。这种情形，看来似乎同水稻需“水”需“旱”的道理有矛盾。其实，这不过是一些现象，如果深入一步追究问题的本质，正可以为这一道理作一个补充的说明。如所周知，上述这些田，要获得较高产量，一般都要在秋收后进行犁耙、整田，使土壤氧化层与还原层搅乱并混入空气，还要把田外的灌排措施搞好，冬、春期间施入大量厩肥或割草压青，增加田里的有机质，以至改善土壤的结构和通气性、透水性。土壤结构改善以后，再进行水旱轮栽，不但可以提高产量，还可以增加复种次数。

从土壤化学方面看，淹灌的稻田土壤，除表面薄层因接触氧气较多，成为氧化层以外，绝大部分耕作层的土壤属于还原状态，称为还原层。还原层中的腐殖质和还未完全腐殖化的有机质，对改良土壤和供应水稻营养都起着重大作用。一般水田中的有机质分解和形成腐殖质，主要是依靠嫌气性细菌的活动。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由于嫌气性细菌的分解活动，伴随着生成一系列还原性物质，如二氧化碳、甲烷、有机酸、硫化氢等。这些物质数量少时，对水稻生长影响不大，如果长期积累数量增多，就会妨碍稻根呼吸和吸收养分，发生黑根、烂根等现象，对水稻生长直接产生有害作用，甚至使全田稻株萎黄，以至枯死。同时还使地力逐渐瘠薄，出现产量减低的倾向。实行水旱轮栽，土壤有机质在种植旱作物期间氧气供给充分，或者在施用有机质肥料的同时施用石灰，使土壤酸性环境得到改善，土壤中不致积累有害物质，土壤贮藏和释放养分的能力就会增强，产量就不致于减低，并且还可以提高。这也就是水稻与旱作物实行轮栽对于熟化土壤、增进地力的实际效果。

我国农民通过长期生产实践，体会到水稻的生长发育过程是需“水”与需“旱”矛盾统一的运动过程。因而，在栽培技术上，采取犁冬晒垡、施用有机质肥料，以及在水稻生育过程中，实行浅水勤灌、间歇灌溉、湿润灌溉、排水烤田、耕耘管理等措施，对生长在淹水土壤中的水稻，人为地给以旱生条件和空气条件，以协调其需“水”与需“旱”的



矛盾关系。并在认识水稻的水旱矛盾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为水旱轮栽制。有些地方由于对水稻的栽培特性了解不够，对于水旱轮栽能够培养地力、促进水稻及早作物持续增产的作用考虑不足，只看到水稻需“水”的一面，而忽略它需“旱”的一面，不恰当地追求一年内连种水稻两熟或三熟，而不顾及水稻对于土壤物理性和化学性等物质条件的要求；或者只看到当季、当年的水稻增产，而忽视它与前后茬作物的全面增产和连年持续增产的长远关系，其结果对生产都是不利的。当然，豆类不是主粮，绿肥更没有直接的粮食收获，而且它们和粮食作物有一定的争地、争肥、争劳动力的矛盾，如果豆类或绿肥种植面积过大，也会影响粮食增产。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面，在目前有机质肥料和化学肥料还不足的情况下，将绿肥和豆类作物的栽培面积缩减，因而不能实行“以田养田”，也会使水稻及其他粮食作物的增产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样就不如实行水旱轮栽、适当地种植部分绿肥和豆类作物的增产效果大。

\* \* \*

水稻与其他旱作物轮栽，是我国农民的宝贵经验。有计划地实行水旱轮栽，适当种植绿肥和豆类作物，做到“以田养田”、“以小肥养大肥”，是多快好省地解决当前增产关键的肥料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由于我国稻作环境错综复杂，有关水旱轮栽的具体条件多种多样，因而轮栽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某一种轮栽方式适合于这

一个地区，不一定适合于另一个地区。在推行某一种成功经验的时候，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认真分析当地的生产条件、耕作习惯和采用这种轮栽制度的经济效果，并且要经过反复试验。在推广的时候，一定要由群众作主，不要包办代替。此外，从研究工作的角度来看，水旱轮栽在理论上和技术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时，应该把水稻和与其轮栽的旱作物的内在因素和外界条件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各地生产实践和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耕层土壤的熟化程度和贮积、释放养分能力的强弱，对保证水稻高产有着重要的作用。像亩产四、五千斤以上的甘薯田，三、四百斤以上的小麦田，其后茬水稻在增施肥料进行丰产栽培时，一般都获得良好的效果，很少发生早期倒伏和空秕粒过多等不良现象。进一步研究这种现象的科学根据，对于今后的水稻增产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有些地区对于绿肥和豆类作物的栽培，多采取粗放方法，产量不高，在选种、留种、施肥和灌溉管理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绿肥和豆类作物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例如大豆一般含有蛋白质百分之四十，脂肪百分之十八，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又是很好的家畜饲料，因而如何提高绿肥和豆类作物的产量和产品质量，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 肯尼迪的二三事

黄 钢

## 肯尼迪与情报

有人說，肯尼迪和共和党的总统比較起来，不过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没有什么不同。

的确如此。

比方美国的新聞电讯早就报道过：艾森豪威尔“总统每天早晨通常接到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向他汇报世界局势的极端秘密的报告。”而肯尼迪总统呢？他要求最近成立的冷战“特别活动中心”“在24小时的基础上搜集美国政府可以得到的关于紧迫关心的局势的全部情报和活动资料。”这就可以看出：阅读情报资料这项工作，是美国前后两位总统每天必上的一课。

在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对古巴反革命流亡分子，給过一百万美元；而从肯尼迪上台到美国雇佣軍入侵古巴之前，为时不到三个月，肯尼迪撥給古巴反革命分子进行顛复活动的費用，就已經高达四百万美元。

为了进一步施行美国情报机构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特务渗透，肯尼迪上台以后，馬上就把国务院原訂的“非洲计划”費用增加到一百五十万美元（比原计划增加三十五万美

元）。不久以前，肯尼迪还要求美国新聞署扩大它对亚非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活动規模，并要求将它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活动經費增加到一亿二千一百多万美元。

美国政府早在肯尼迪上任前就拥有十万名从事間諜情报活动的人员，每年都以三十亿美元来作为从事特务工作的經費。肯尼迪除了继承过去的一切之外，还想出了以“和平队”的美丽称号，去打扮那从事間諜情报与顛复活动的特务派出机构。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在任时打算要撤回一些駐在外国的美軍家屬，肯尼迪却在考虑，如何利用那数目近于五十万人的美国海外駐軍家屬中的成員，去扩大和加强对于外国政治生活的渗透作用。

在从事諜报工作方面，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做得更加急切。他露骨地要求亲手参預美国的間諜情报活动。而这一点，也就是美国政府新近成立的高级情报机构和策划冷战的中心——“特别活动中心”应运而生的来由。

什么是“特别活动中心”呢？

它是美国各个情报系統联合的統一



組織。

它是美国各个情报中心的中心。

它是美国各个特务首脑机构中的首脑。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这个“特别活动中心”的常任工作人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国防部、还有国务院的有关人员，也许还可能包括一位美国新闻界的代表。美国官员们形容这一机构时说：“成立这个小组（中心）是为了加速把现有的机构的情报连同采取行动的建議一起轉給总统。它然后将负责使总统的命令迅速得到执行”，并且还“有责任一直負責到底”。

这就是說，肯尼迪总统的一项新建树就是：負責策划与檢查督促美国冷战政策的高级决策机构是进一步的强化了！

在这个冷战高级指挥所里坐上了一个最具权威的司令官，这就是肯尼迪本人。

肯尼迪一点儿也不满足于他那間接控制与所謂“監督”美国情报系统的地位（如像艾森豪威尔所曾做过的那样），而是空前热心地把自己的座位移进了間諜与情报系统。既是美国白宫的总统，又是情报系统的主脑，一身而二任焉；誰还能說他不是一个人物呢？

### 肯尼迪的“誤信”

肯尼迪宣誓就任总统以前，在馬薩諸塞州議會（今年一月九日）的演說中，曾經說過，他今后工作的“成敗”，首先取決于他“是不是真正有勇气”和“是不是真正善于决断。”

入侵古巴事件证明了肯尼迪的“勇气”。

这一事件如今已“作为‘肯尼迪的愚行’載入史册”（四月二十三日新加坡《海峡时报》）。

美国在古巴的惨敗，还证明了肯尼迪是否“善于决断”。

“总统判断的健全性，至少可以說是有問題的”（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泰晤士报》）——这是倫敦对于肯尼迪先生智力水平的回答。

尽管美国入侵古巴的行动已經被世界輿論认为“是不合适的、愚蠢的、笨拙的、狂妄的

等等”（美国新聞处五月四日电訊），但美国却有一些报刊替肯尼迪遮遮盖盖，說什么美国在古巴的出丑，似乎主要是由于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錯誤；說毛病似乎是在于“低能的情报分析”。

其实，事情的关键并不在此。

五月十二日出版的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对这一点作过分析。它說：“經驗证明，如果使情报机构也負責政策的話，他們搜集的情报将附加色彩，以适合他們的政策。古巴事件的大失敗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美国中央情报局恰恰是在肯尼迪的干涉与顛复古巴政策的指导之下，因此才对他們尊敬的总统，拿出了附加了色彩的、把古巴局势說成是“有机可乘”的情报資料。





为了追根溯源，人们稍稍回想一下肯尼迪对中央情报局的特殊关连是有益处的。

在上面举到的肯尼迪对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演说中，他说到自他当选以来的六十天之内，对于“建立政府（按即挑选班底）的工作”，“是一个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的过程。”可是，仅在肯尼迪当选后两天，人们很快就看到他宣布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倫·杜勒斯和另一名特务头子埃德加·胡佛（联邦调查局局长）留任原来职务的消息。这是肯尼迪当选后所做的第一桩事情。

肯尼迪当时解释这一任命的时候，就给予了艾倫·杜勒斯政策方针方面的大力支持。他认为使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个职位继续保持它的稳定和方针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说：肯尼迪继承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全套特务衣钵。

在这一星期以后，特务首脑艾倫·杜勒斯就被邀请到肯尼迪的海滨别墅里去，“磋商各项全球性的问题”，“包括加勒比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汇报“极端机密的情报。”合众国际社说他们这次的会见，商谈了两小时又四十分钟。

这些都说明了：新任总统肯尼迪对于冷战与颠覆活动，已经热衷到何等的程度！说明他对于插手干预古巴的事，早就是急谋而不可待了……。

在这以后，在古巴发生的事情，很快就 在世界人民面前露出了底细……这是人所熟知的了。

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么？

果真是仅仅因为对于中央情报局的“误信”，才使得肯尼迪发动了对古巴的入侵并落得大败而回么？

不！连英国《新政治家》杂志都指出过：问题的渊源是“在四十年代后期，美国有意識地选用颠覆活动。”不过，《新政治家》杂志同时也认为：“基于人们有深切的道德感，而且也基于常情”，美国中央情报局经常采用的这种“颠覆活动”方法，往往却招致到“削弱了西方”的相反效果；特别是那些例如U—2型飞机入侵与古巴事件等等“声名狼藉的失败”，“使西方丢脸”。

即使是对于美国特务机构“声称获得的一些暗下的‘成功’”（例如“把卢蒙巴赶下台”），英国《新政治家》也还是感到忧戚满怀。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它们担心人们很容易从卢蒙巴被害的血迹之中，辨认出美国刀斧手的血印的缘故吧……

——例如肯尼迪总统最小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在被派往非洲“调查”之后，在纽约海外记者俱乐部的一次演说中就不得不承认道：非洲的领袖们认为，卢蒙巴之所以被废黜是因为“他失去了西方的欢心”，“卡萨武布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产物。”

这就可以看出：美国的颠覆政策并不能在任何地区换来好的名声。相反地，正像是《新政治家》评论所表示的那样：美国颠覆者“破坏了国际法治，他们自己将首先遭殃。”——遭殃的明显后果就是：颠覆者首先颠覆了自己装扮的声名。



## 肯尼迪与“失密”

肯尼迪埋怨美国报界过多地泄漏了他的国家的机密。

四月二十七日，他在纽约美国报纸出版者协会的演说中“要求美国报纸对与安全有关的新聞，实施战时尺度的自我检查”。

日本共同社对此评论道：肯尼迪的“这种呼吁，在美国来说，除了在战时，是从来没有发出过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肯尼迪总统所抱的危惧之感是多么大。”

你的恐惧是为了什么呢？肯尼迪先生！

肯尼迪回答：他已经感到“在一次秘密的冷战中面临的两难处境没有解决办法。”

肯尼迪还说：“我对于我所提出的两难的处境并无容易的解决办法”。

肯尼迪总统一方面要标榜“自由”，标榜“和平”，另一方面既是公开进行冷战，又是加紧准备热战——为此就必须严格控制新聞，撕碎自由的遮幕。这的确是“两难的处境”。肯尼迪在两难之下，自感心虚，羞人答答，讲不出口。

不过，他终究不得不讲出来。而且并不算是吞吞吐吐——讲得还算干脆俐落。虽然他也曾承认：“在和平时期，就这个问题（按即新聞保密要求）进行的任何讨论以及随后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痛苦的和没有先例的。但是（在这一个‘但是’之后，肯尼迪宣布——）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与危险的

时期。”

肯尼迪在纽约演说中明白地说：“如果我们从事公开的战争，无疑，它们（按指美国报刊）原不会公布这种消息。但是由于没有进行公开战争，他们只认识到新聞工作的标准，而没有认识到国家安全的标准。”环绕着这一点，肯尼迪埋怨美国新聞界没有认清形势——这就是他们的总统对他们所提醒的：美国当局既不想放弃冷战，又还要加紧准备热战的微妙的时刻。

总统先生当时在阐述这种形势与任务的时候，又说：虽然现在“并没有宣战、没有越过边境、没有发射导弹，”虽然“现在没有宣战——不论斗争多么激烈，也许决不会以传统的方式宣战”，但是，肯尼迪总统所阐述和意识到的“史无前例的和平与危险”“要求政府、人民，每一个企业家、工会领袖和报纸改变看法，改变策略，改变任务。”

这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肯尼迪的演说的一个中心。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心。这次演说，活生生地概括出美国总统在那里既要想伪装成和平与自由的天使，但同时又决心充当冷战与热战的祸首的两面态度，两面政策。

肯尼迪这次空前严厉地警告他的新聞界说：“如果报界等到正式宣战以后才对战斗情况的报道实行律己行为，那么我只能说没有任何战争对我们的安全的威胁比这（按指



报界的失密)更大的了。”很显然,肯尼迪这里是责怪他們的报界在对待美国不宣而战地入侵古巴的时刻,沒有“实行律己行为”。

美联社的新闻分析員罗伯茨在报道肯尼迪这次演說背景时写道:以肯尼迪为代表的美国官方当时曾經考虑要提出一項报界保密法令,而这一点“首先的考虑是为了保护中央情报局”。

被肯尼迪和美国官方渲染得有声有色的所謂“失密”,难道真的怪它們的新闻报刊嗎?

对美国报界进行指責的肯尼迪,大概是忘記了,就在他讲这些話的五个月以前,即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已經当选但还未上任的总統本人,就曾經指責过“艾森豪威尔政府一貫地采取封鎖重大公众情报的政策。”当时,肯尼迪再一次要求副总统尼克松发表一項有关美国实力的秘密报告。在这份秘密报告里,据說“有十个国家认为美国的軍事力量落后于苏联”。当时的国务卿赫脱,以及掌管这类秘密情报的主管人之一(美国新闻署前任署长)艾倫,都曾經干脆拒絕了肯尼迪提出的公开秘密情报的这项要求。

同肯尼迪一起大喊“不要声張”(加强保密)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納馬拉,在他沒有正式上台以前,同样也叫喊过,“放宽保密”應該成为国防部新聞机构今后的新方針之一。

可見得問題的玄妙并不在这里。

我們对于美国报章是否違背了它們的所

謂保密事項,当然不发生什么討論的兴趣。

引起我們兴趣的是:在世界公众面前,如果真正要說到美国的政治失密,那倒是确有其人!那就是美国今天的軍政头号首脑。不是別人,正是他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当前美国全盤的战略与战术。

卢蒙巴的被謀杀,暴露了肯尼迪笑臉之下的刀口是何等鋒利!

入侵古巴的惨敗,使肯尼迪很快贏得了“二十世紀海盜总統”的声名。

無論是派到老撾丛林里去的美国軍事“专家”,还是那派到南越土地上去的美軍“特种部队”,都暴露了肯尼迪准备进行有限战争的高度积极性。

派到东南亚去巡行的約翰遜的活动,說明了美国总統府的公事皮包里,究竟有多少骯髒的貨色,有多少玩弄政治阴谋的魔术棍!

如此等等,对于那些原来沒有认清和正在认清肯尼迪真正面貌的人們說来,都可以算作是华盛顿白宮的真正失密!

肯尼迪亲手丢失了这一切重大“机密”。但是这又有什么奇怪?他的第一号助手、副总统約翰遜不久前还明白公开地表示:美国并不安于那一种让半个地球留在別人手中的和平“共处”!約翰遜的这种好战的申明,真正是泄露了肯尼迪的“和平战略”与冷战策略的根底。

美国当前最大的“失密者”,原来就是肯尼迪总統自己!

